

一、中共「十八大」會前總體觀察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張執中副教授主稿

- 整體來看，對胡溫執政的評價、政治報告內容、薄案的最終處置與高層結構調整是「十八大」前的觀察重點。
-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7 月 23 日的講話，被視為「十八大」政治報告的藍本。胡提出「兩個繼續」，目的在於「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與傳承，並定下未來「習李體制」的發展路線。
- 薄案除牽動「十八大」的人事布局，也影響派系、政法系統等勢力消長。媒體預測，政治局常委可能削減文宣與政法，「縮編」回「十六大」前的七人制。
- 未來新領導人上台如何在政治改革上有所建樹，仍有許多不確定性。而「維穩」路線將由政法或是民政、社會服務等系統主導，亦值觀察。

中共「十八大」擬於十月中旬召開，由於正值十年一次的最高領導班子世代交替，領導層過半的代謝率，成為新一代菁英競逐的目標。不過，年初爆發薄熙來事件後，牽動整體的人事布局與黨內鬥爭，也迫使中共中央必須強調「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要求全黨全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對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以下簡稱胡溫）而言，「十八大」召開前，政治報告需定調、黨內必須統一思想，以及薄案必須有所交代，最終在思想、政治與組織路線上建立共識。因此，整體來看，對胡溫執政的評價、政治報告內容、薄案的最終處置與高層結構調整是「十八大」前的觀察重點。

（一）檢視胡溫十年

「十八大」除了是最高領導班子世代交替，同時也要總結現任領導班子的政績。當前大陸官方媒體的宣傳工作已全面展開，對胡溫執

政給予高度評價，比如人民日報提出「黃金十年」(人民日報，2012.6.5)，並以頭版特稿，針對「十六大」以來發展歷程進行六個系列述評(人民日報，2012.7.25)，以經濟地位、奧運世博、神州飛船、大國崛起、行政改革、社會建設、思想理論等進行正面表列。

相對的，這些發展成就背後所存在或衍生的問題，可能不斷腐蝕前述的成就。因此黨內亦有不同聲音，認為不應「隱惡揚善」。如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在媒體以「胡溫的政治遺產」貼文，除了闡述胡溫十年的成就，同時也指出胡溫在這十年未能解決貧富差距、腐敗、社會整合與公民權等最迫切的十大問題(包括經濟結構調整、收入分配改革、打房與社福制度、戶籍改革與人口政策、環境污染、教育改革、社會道德與核心價值、社會矛盾與政府治理、中產階層與政治改革)，使中共自身面臨統治的合法性危機。這些問題成為胡溫沒有解決的政治遺產，也是習李接班後的主要挑戰。新領導班子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將影響大陸下階段的發展，因此必須要有危機感(財經網，2012.8.30；2012.9.2；2012.9.3)。不過，當前中央要求全黨全軍保持思想認識的統一，作者的心思顯然不符當局的主旋律，貼文很快被封鎖，只留下前後段文章，但也顯現內部對胡溫政績的認知分歧。

(二) 胡錦濤「723講話」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7月 23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這篇被黨內定調為「回答了黨和國家未來發展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講話，正值中共處於高層人事與薄案定性的紛擾中。其內容從旗幟、道路、目標與狀態四方面闡述，除了總結「十六大」以來的成果，主要目的仍在統一領導幹部思想，也被外界視為「十八大」政治報告的藍本。

「723講話」基本上不脫離「十七大」以來歷屆中全會的主軸，包括執政能力、城鄉結構與社會保障、黨內民主、「十二五規劃」與文化體制改革。但是對胡錦濤而言，其執政的核心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以及「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胡雖然積極推動「科學發展觀」的集體學習，但是對學習結果顯然下了不滿意的結論，並指

出當前領導幹部的**主要問題**（包括重「顯績」輕「潛績」、思想不夠解放、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尚未改變、決策科學化不足，幹部考核體系不健全，求是，2009 年第 1 期）。而這些問題和前述鄧聿文文章所指基本相同，顯示黨內上下之間思想與行動難以統一，也讓胡在去年「七一講話」中透露中央對於維繫合法性產生的危機感。因此邁入「十八大」要進行總結與交班，胡提出「兩個繼續」（繼續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其目標當然是「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與傳承，並定下未來「習李體制」的發展路線。

（三）薄熙來事件後續

薄、王事件涉及的貪腐與刑案，以及操弄權力及壓制人權，與任內「唱紅打黑」形象形成強烈對比，也提供外界一窺金字塔尖的權力運作以及中共菁英政治的問題所在。只是薄熙來的位階，以及在黨政軍系統的影響力與左派勢力的支持，讓中共中央在處理過程中有所顧慮，但也必須在「十八大」前落幕，對薄案定性。目前對薄熙來與其妻薄谷開來的處理方式已逐漸明朗，即對兩人分割處理。薄谷開來的殺人案，合肥中級法院在 8 月 20 日做出死緩的判決（新華網，2012.8.20）。從判決內容與被告的對答，可以看出中共想藉此淡化政治色彩並對外塑造依法治國的形象。至於王立軍部分，大陸檢方已就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濫用職權罪以及受賄罪等四項罪名對王立軍提起公訴（新華社，2012.9.5）。

而在薄熙來的處理方面，自三、四月間中央「停止」薄的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職務，立案調查至今並沒有進一步發展，只表達了中央對薄熙來「違紀」的認定。若對照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案的處理，陳案先有中紀委的報告，罷免陳良宇人大代表資格，經過政治局審議與「雙開」處分，到全會（十六屆七中全會）審議確認後才移送司法機構。但從薄案至今仍未見中紀委調查報告，全國人大也沒收到終止薄代表資格的審查資料（聯合新聞網，2012.9.1），可以看出薄案的複雜感性與中共處理陳、薄兩案的「差別待遇」。隨著「十八大」的日程逼近，中央可能「按部就班」的快速處理，或者至七中全會「一次性處

理」。當確認了薄熙來違紀情節輕重，按「紀律處分條例」規定，在「免除黨內職務」外，只剩「留黨察看」與「開除黨籍」兩個選項，最後結果可能受限於胡溫「樹立威信」或「黨內和諧」的選擇。

（四）接班梯隊

薄案除牽動「十八大」的人事布局，也影響包括太子黨、新左派、政法系統等勢力消長。觀察媒體近來的報導，一方面自八月中旬後，政治局常委紛紛「露臉」，顯示北戴河會議已告一段落（多維新聞網，2012.8.15）；另一方面，政治局的甄補，依「七上八下」的原則，1944年以前出生者屆時都將退休。因此在政治局25位委員中，將有14人退下，當中包含7位政治局常委。除習、李接班態勢穩定，中組部長李源潮、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國務院副總理兼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中宣部長劉雲山、國務委員劉延東、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孟建柱都是熱門常委人選。但越來越多媒體報導，政治局常委可能削減文宣與政法，「縮編」回「十六大」前的七人制，也預示競爭更加激烈（多維新聞網，2012.6.1日；明報新聞網，2012.9.3）。

再者，習近平的接班佈局也有進度，今年七月初四級黨委才剛結束，貴州省委書記在七月中就進行第一波職務調整。原省長趙克志升任省委書記，原新任書記，62歲的栗戰書先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至九月初確定接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人民網，2012.9.1），成為習近平的核心幕僚。原中辦主任令計畫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兼任統戰部長，依慣例將於明年兩會換屆時，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56歲的令計畫長期跟隨胡錦濤，為核心幕僚之一，原本外界看好進入政治局，但是否如媒體報導因其子捲入車禍醜聞（南華早報網，2012.9.4），將隨著胡的卸任而淡出？或有機會歷練部門或地方一把手？仍有待觀察。但習近平已開始進行人事布局，剛組成的省委班子近期內應該也會有下一波職務調整，也勢將牽動外界對接班梯隊的預測。

最後，外界仍關注「十八大」後，胡錦濤是否依循江的模式，繼

續留任軍委主席。若觀察胡錦濤「十六大」以來積極建制的心態，比如從縱向到橫向，對黨政領導幹部從推薦、考核、交流、任期、監督到培訓，建構較為完備的幹部人事體系來看，比較有可能藉「十八大」建立軍委領導人的接班制度，避免新領導班子仍要面對「兩個核心」的矛盾。但是在當前黨內激烈的人事競爭下，也不能排除黨內派系利益考量，或以政權穩定為名而「扶上馬、送一程」。

（五）結語

在「十八大」前夕，外界最關注的議題莫過於最高領導班子的組成。因此在九人與七人的選項，加上派系成員在常委的比例，影響的是胡錦濤勢力的延續與習近平權威的鞏固。未來領導班子勢將面臨同僚的更多挑戰，也須更仰賴集體領導。在此背景下，有以下幾點值得觀察：

1. 從年初薄熙來事件，到當前「政治遺產」說與胡的「723 講話」，面對國家社會間與黨內思想的分化，即使中央提出「正本清源」或「統一思想」，可以看出各方勢力在未來的路線規劃上爭取話語權。問題是，當中央「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前提下，是否能存在「改革派」？再者，強化集體領導意味削弱核心領導人的權威，因此在「穩定」與派系平衡的考量下，新領導人上台後如何在政治改革上有所建樹，仍具有許多不確定性。
2. 政治局常委人數的由九變七，無論受薄案影響、分解政法勢力，抑或提高決策效率考量。對於新領導班子推動「創新社會管理」機制，在資源配置上可以較為平衡。但關鍵還是在於中央與地方領導人，習於利用政法系統「維穩」，還是轉而發展民政、社會服務等系統來決定。加上近來包括廣東、江蘇都發生重大抗議事件，挑戰被外界所稱許的「烏坎模式」，也將造成黨內對維穩路線的分歧。
3. 從「紅歌」現象到「重慶模式」的討論，起因來自對社會失衡與濫權貪腐的不滿，而這個不滿因薄案也延燒到最高領導層。雖然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下，派系間最終形成權力平穩過渡的共識，使薄案

最終只在於個人權位的變動。但從媒體對令計畫之子捲入醜聞與相關掩飾行為，以及對令職務調動的相關性報導，顯示權貴資本主義對高層領導人發展的殺傷力，也是左派結合社會支持的重要依據。總之，在胡錦濤為「十八大」定調後，如何處理胡溫時期的政治遺產才是習近平接班的最大挑戰。

二、大陸網路發展及其對當前發展中的公民社會之意涵

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洪敬富副教授主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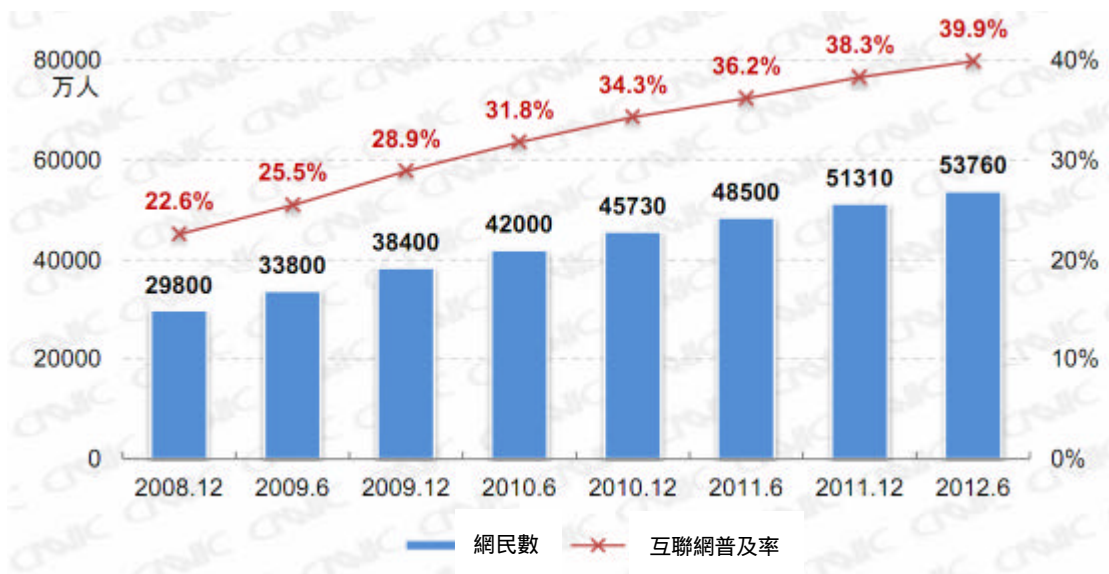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 在「第 30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中顯示，大陸網民數量達到 5.38 億人口，使用手機上網之網民首度超越電腦網民人口。整體網路普及率已達近四成之規模。

大陸網路發展不僅對其國際經貿活動帶來正面商務利益，更對其社會與政治發展產生深遠的作用。

大陸網民近年來利用網路通信科技行使公民權利，催化公民維權意識，有助大陸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

(一) 近期大陸網路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的發布

眾所矚目之「第 30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已於 2012 年 7 月 19 日在北京發布。大陸準官方機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 在最新的「報告」(CNNIC 於 1997 年 11 月發布第一次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隨後，每半年定期在 1 月和 7 月各公布前半年之網路發展統計報告，至今已歷時 15 年之久) 中顯示，截至 2012 年 6 月底，大陸總體網民人口已高達 5.38 億 (事實上，大陸已於 2008 年以 2.98 億網民總數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網路市場；該年大陸的網路普及率也以 22.6% 超越全球平均水平的 21.9%)，網路普及率達到 39.9%。換言之，每十個大陸人中即有四人為網民，這對大陸漸漸成形中的資訊社會 (大陸稱「信息社會」) 乃至於公民社會提供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表中為近幾年大陸網路發展規模與網路普及率的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CNNIC「第30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頁10。

在此「報告」中，值得關注的一個新趨勢是大陸手機網民以 3.88 億人口首次超越桌上型電腦網民（3.80 億）。這意味著由於智慧型手機（大陸稱「智能手機」）功能越來越強大，價格也日趨低廉，使得包括龐大的流動人口和農村人口在內的所有大陸城鎮居民（市民）、農民工，更能便利而廉價通過手機上網。與此同時，手機微博的使用率較先前上升至 43.8%，成為目前大陸使用率增幅最大的手機應用。手機微博用戶的不斷增長對於當前大陸社會中存在許許多多的群體性事件、突發事件、以及興起中的公民記者、調查記者、公民維權主義與行動等，具有相當之促進與互為構成的影響，也對大陸未來之政治與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之影響。

（二）網路通訊科技發展對大陸政治與社會發展的經驗意涵

回顧以往，20 世紀以來，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媒體主要是以印刷、廣播和影視等形式存在的紙本出版物、電視或電台。90 年代迄今，網際網路的應用與創新，將傳統媒體形式轉而以「數位化」的方式呈現，特別是以電腦、手機和多媒體等以網路通訊科技為介面的虛擬空間，在相當程度上已豐富、甚至改變了傳統媒體的傳播模式與內容，並逐步成為全球化時代人們生活所廣泛倚重的媒體平台。相較於早期

的傳統媒體，數位技術的特性突出了當代媒體發展的特色，其中又以網路通訊科技為核心，被廣泛稱呼為「新媒體」。此類新興傳播工具具有「即時性」、「互動性」、「非同步性」、「非線性」和「打破時空限制」、「低成本」與「匿名性」等特質，可協助現代公民迅速地進行資訊交換，以達成或彌補其他傳播行為不足的需求，提供網路作為「中介傳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重要表徵。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日益加深與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深化，其平均國民所得(已超過五千美元)與教育水準亦隨之顯著提升，帶動著一批批中產階級(階層)在沿海與都會區的快速崛起。然而，長期以來存在於大陸社會的種種「不公義」事件，已無法再以過去傳統威權體制下的「封鎖」與「鎮壓」作為解決的「硬」途徑。在黨國政府無法「完全有效」且依法「適當」地處理此等社會衝突與矛盾的內部壓力下，大陸人民利用網路通訊科技進行資訊傳播，作為集結群眾力量的中介平台，對黨國政府提出行使憲法所賦予公民權利等要求，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公民維權行動，觸動大陸威權政府的敏感神經，並可能對未來的政治與社會穩定提出嚴峻的挑戰。是故，此等草根群眾和網民的虛擬與實際作為，催化出當前大陸更大、更強的公民維權意識抬頭，作為公民維權行動強化的重要思想準備與心理基礎。

隨著「公民維權」行動在許多群體事件與維權事件中不斷地得到強化，公眾和網民不僅更為迫使中央或各級地方政府在人民「知情權」的普遍要求下，對境內外所發生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事件作出比起以往更多、更為透明，且更加迅速地回應或解釋；公眾和網民也越來越與黨國政府爭奪虛擬與現實生活的話語權，藉以強化其在公共事務上的「議題設定」的能力，這也將有利於促進大陸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

(三) 結語

大陸草根公民力量正利用網路通訊科技崛起，作為侵蝕並分享黨國在公共事務中獨攬「議題設定」的權力。在經濟升級或權力市場化

等因素導致社會嚴重不公及貪污氾濫所產生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衝突之下，當新媒體涉入大陸社會與政治的生活領域之中，由於其本身低成本、高互動性且易於傳播的特性，催生出一種有別於純粹為傳統政府與知識菁英階層的「公民」力量；利用微博（新浪或騰訊）、部落格（博客）、網路論壇、網路社群等以新媒體為主的「流動空間」，作為水平式傳播、溝通、聯繫、參與、串連、與行動中介的平台，藉由網路形成輿論氛圍，喚醒並強化公民維權意識與動員，進而對黨國政府進行縱向的互動或挑戰。

大陸自 1994 年加入網際網路以來，新媒體對大陸經濟發展的助益，乃至於對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推進呈現顯著性的影響。網路通訊科技在大陸的使用，逐漸成為其公民社會萌芽和成長的重要養分。在經濟升級或權力市場化等因素導致嚴重社會不公及貪污氾濫所產生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衝突之下，早期依附在黨國體制下發展的民間社會，已經開始形成一個相對獨立於傳統威權政府之外覺醒中的公民社會意識與行動。而當前的經濟社會環境和科技技術正為網路媒體時代下的大陸國家 - 社會關係提供變遷的可能，這種可能來自於新媒體其獨特且關鍵的作用。這種作用在於網路媒體使得草根公民力量得以藉此侵蝕並分享黨國在公共事務中獨攬「議題設定」的權力，隱然成為在現行黨國體制下，推進廉政、勤政，與公民（網路）監督的另一項利器，並成為未來大陸公民社會成長與茁壯的重要根基與條件。

三、中共再次反對軍隊國家化的意義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王崑義兼任教授主稿

- 中共自毛澤東確認了「黨指揮槍」的建軍傳統，共軍建立 85 年來，即因維護政權之穩定性，反對軍隊國家化。
- 今年薄熙來事件、內部腐敗問題等內憂，加上南海、東海爭端等外患之諸多不穩定因素，使中共認為必須要有堅強的「黨軍」，才能維護「十八大」政權平穩交接。
- 共軍強調「積極防禦」與「後發制人」的「柔武」戰略，也多次重申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惟其軍費連年增長，已令周邊國家感到不安。

2012 年 7 月 31 日，大陸軍方舉辦記者會。共軍這個記者會，媒體的問題和軍方的應答，都已經過事先設定，而且出動了共軍四總部的四個筆桿子來回答問題。在所有問題中，只有一個引起人們討論，就是中共軍方再度高調反對「軍隊國家化」。

同一天，大陸國防部長梁光烈在紀念建軍 85 周年招待會上，也強調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共軍總政治部軍官則說，堅決反對任何將軍隊「去政治化」的思想，並說上述思想別有用心。

（一）不放棄黨指揮槍的傳統

「黨指揮槍」一言最初出自毛澤東在 1938 年寫成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原文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毛澤東認為，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的雙重壓迫，中國共產黨是無法通過和平合法的方式爭取到勝利；他還提到，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最終在國共分裂後遭到鎮壓；然後，毛澤東以中國國民黨控制軍隊的戰爭史來引

例，說明中共應該「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同時提出了「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的原則。

由於毛澤東確認了「黨指揮槍」的建軍傳統，再加上「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名言，所以共軍建立 85 年來，就一直被中共牢牢掌控，即使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時期，中共仍能完全控制軍隊，沒有讓中共政權崩潰。

而 1989 年六四事件發生時，在鄧小平一聲令下，共軍立即把坦克車開上天安門廣場，對著手無寸鐵的學生大肆殺虐，目的除了保衛共產黨的政權之外，也讓中共政權在 1990 年代「蘇東波」變局中不受到影響，仍能繼續維持中共政權於不墜。

就因有這些案例在先，在「一黨專政」的原則下，中共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性，不時的都要強調反對軍隊國家化，反對軍隊非黨化與去政治化。這種情況就像共軍總政辦公廳政研室副主任王永勝所說的，任何國家的軍隊都有政治屬性，也有國家性質，作為國家組成部分的軍隊，當然要從屬並服務於這個國家的執政黨。這也是共軍一直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人民的軍隊的主因。

（二）面臨內憂外患顯現權力交接的不穩定性

今年中共將舉行「十八大」，胡錦濤將把政權交給習近平，然而中共今年以來所面臨的內憂外患，讓中共政權轉換更顯得兇險。

在內憂方面，除了從薄熙來事件反映出來，中共的權力交接仍然存在著高度的不穩定性。同時中共內部腐敗的情況，派系之間，利益集團之間裂痕的加深，他們對未來的大陸社會應該所走的路線和方向也存在著高度的分歧。

在這種內憂外患下，中共想要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做出任何實際性改革都舉步惟艱，這就是中共現在面臨的情況，但是這種情況下中共必須要完成一個權力的換代和交接，在這個權力的交接過程，又會使所有的關鍵矛盾糾結，實際上形成中共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而在外患方面，從南海的島嶼爭端，到東海釣魚台列嶼所引發的

大陸與日本的矛盾，在在顯現出中共正面臨一個不穩定的外部環境，這對中共權力交接將形成一種壓力。因此，中共在「八一建軍節」前夕再度喊出反對軍隊國家化，其實有它擔心政權能否平穩交接的憂慮存在。

這種情形，正如大陸國防部長梁光烈在「八一建軍節」慶祝會上致辭時所說，當今世界正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更加艱巨。軍隊因此必須進一步增強機遇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使命意識，努力提高以打贏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

梁光烈還特別指出，軍隊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繼續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為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作出應有努力。顯然，中共面臨的內憂外患，必須有一支堅強的「黨軍」，才能維護政權平穩交接，這也是今年「八一建軍節」共軍必須再次強調反對軍隊國家化的主因。

（三）強調「積極防禦」與「後發制人」的戰略原則

雖然中共反對軍隊國家化，但自從中共建軍以來，共軍本質上呈現的是一支崇尚「柔武」的部隊。所謂「柔武」，指的是中共一直強調「積極防禦」的政策，而且還強調「後發制人」的戰略。

而「積極防禦」，依照毛澤東的解釋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在作戰指導上是防禦和進攻的交互作用，通過防禦，保存軍力，待機破敵，最後達到反攻和進攻的目標。

而「後發制人」，指的是戰略上的後發制人，是指不首先挑起戰爭，戰略上不打第一槍。而一旦敵人挑起了戰爭，就應依據具體情況，採取相應的軍事行動，去努力爭取戰爭的勝利。這是積極防禦戰略的基本指導原則。

戰略上堅持後發制人，從根本上說，是由革命戰爭的政治性質所決定。馬克思主義認為，戰略是由政略決定的。由於不同階級、不同性質的國家，進行戰爭的政治目的不同，所以在戰略上採取先發制人，

還是後發制人，必然受政治的制約。

另外，毛澤東在「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一文中則指出：「我們是不是去侵略別人呢？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我們歷來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共產黨一貫的原則立場。

因此，在「積極防禦」與「後發制人」的原則下，大陸對外所採取的就是這種「柔武」的戰略。這也是今年大陸「八一建軍節」，大陸國防部除了反對軍隊國家化之外，還多次重申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並指大陸會堅守「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力求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然而，大陸每年的軍事開支都讓部分國家難以放心，共軍的壯大可能打破地緣戰略平衡的說法也由此而生。在美國、英國等都在紛紛下調國防預算的大環境下，大陸今年的國防預算將同比增加 11.2%，這已經連續將近 20 年持續兩位數的成長。

（四）結論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中共今年的權力交接期，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環境挑戰，但因中共一直崇尚「柔武」戰略，使得儘管外部環境的島嶼爭奪越加複雜化，但中共與周邊國家大動干戈的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再次強調反對軍隊國家化，必然有維護政權穩定交接的意義存在。中共只有牢牢的掌控軍隊，才能避免內憂外患衝擊到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四、當前美「中」對於南海議題之立場及其政治意涵

政治大學外交系盧業中助理教授主稿

- 本年 7 月中旬在柬埔寨召開之東協外長會議，由於各國對於是否討論「中」菲之黃岩島爭議出現分歧，故未能討論「南海行為準則」，僅通過「東協國家對於南海問題之六項原則」聲明。
- 東協國家提出六項原則聲明之後，大陸旋即宣布成立三沙市，引發菲律賓及越南的抗議，美國國務院也立即表示「非常擔憂」。但大陸於 8 月也安排軍方高層密集出訪，試圖穩定周邊國家關係。
- 美國務卿柯琳頓訪問北京試圖降低緊張情勢，惟陸媒已先為此行進行負面解讀，大陸官方並取消習近平與柯琳頓的會面，引發各界揣測與釣魚臺及南海問題有關。

南海問題自 2010 年以來，由於大陸與菲律賓及越南之間的衝突加劇（聲索國尚包括我國、馬來西亞及汶萊），也為美「中」之間的角力提供了新的助燃劑。大陸於本（2012）年 7 月 24 日正式於海南省轄下成立三沙市（設立於永興島），管轄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島之島礁及其海域，並將建立警備區。另同時宣布，三沙市之設立是大陸對現有地方行政管轄機構之必要調整。事實上，大陸方面本次舉措，可以說是更進一步朝向有效控制（effective control），為其未來在南海議題上之發言權增添籌碼，並具相當大的政治意涵。美方對此則立即作出回應，國務卿柯琳頓（Hillary R. Clinton）於 9 月 4 至 5 日進行年內第二次北京行，也與大陸領導階層商談相關議題。美「中」雙方有關南海議題近期發展之立場及意涵如下。

（一）相關國家之「南海行為準則」，未能順利於本年 7 月間東協外長會議時展開討論

有關南海問題之相關爭議，美國表示不對主權問題持任何立場，但公海航行自由係美國之國家利益，希望相關國家透過談判並以和平方式解決包括「中」菲間有關黃岩島，及「中」越間有關南沙及西沙群島之相關爭議。對美國而言，處理爭議的關鍵之一，就是希望相關國家儘早以 2002 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為基礎，通過「南海行為準則」，將彼此在此區域的互動模式進一步法制化。

然而，本年 7 月中旬在柬埔寨召開之東協外長會議，由於各國對於是否討論「中」菲之黃岩島爭議出現分歧，故未能討論「南海行為準則」，僅通過了一項「東協國家對於南海問題之六項原則」聲明。此六項原則包括：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落實宣言之後續行動綱領；儘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尊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準則；各方自我約束、不使用武力；及按照國際法準則和平解決爭端（ASEAN

Secretariat Website, 2012.7.20；BBC 中文網，2012.7.21）

（二）美方認為三沙市的設置不利區域穩定

在東協國家提出六項原則聲明之後，大陸於 7 月 24 日宣布三沙市正式成立，立即引起菲律賓及越南的抗議。美國國務院也立即表示對此一發展「非常擔憂」，美國國會也認為設立警備區更是挑釁之舉措。美國國務院代理副發言人范垂爾（Patrick Ventrell）並於 8 月 3 日以正式聲明方式指出，大陸設立三沙市並預備於其上建立警備區的舉動，「有違各國在外交上合作化解歧異的努力，也將進一步升高當地的緊張情勢。」同時，美國強調「相關國家應該一同在外交上努力化解紛爭，而非以強迫、恫嚇、威脅和武力等方式解決」，並認可東協國家所提出之六項原則（U.S. Department of State Website, 2012.8.3）

北京方面對此聲明反應強烈，並於 8 月 4 日召見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臨時代辦王曉岷，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2.8.6）其後，大陸外長楊潔篪於 8 月 9 日至 13 日訪問印尼、馬來西亞、及汶萊，表示願意與渠等一起為達成「南海行為準則」而努力。楊潔篪此行獲得馬來西亞與汶萊的口頭支持，而菲律賓與越南則認為此一訪問

或有些許效益，但主要還是為了分化東協國家的立場（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ebsite, 2012.8.15）。自 8 月下旬起，人民解放軍高階將領頻繁出訪週邊國家以及美、俄等國，包括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訪問印度及寮國；中央軍委委員、海軍司令員吳勝利訪問土耳其；副總參謀長馬曉天訪問越南、緬甸、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副總長魏鳳和訪問俄羅斯；副總長蔡英挺訪問美國等；大陸外交部並於 8 月 30 日宣布美國國防部長將於 9 月中旬訪問北京（中國新聞網, 2012.9.4）。這些舉措，可以看出大陸試圖先穩定與周邊國家關係，避免這些國家在釣魚臺及南海問題越演越烈之際，受到美國及日本的分化。

（三）柯琳頓訪問北京試圖降低緊張情勢，惟成效有限

美國近年強調以亞洲為重心之「再平衡」政策，國務卿柯琳頓在 8 月 31 日於庫克群島參加南太平洋論壇時指出，美國在南太平洋事務方面歡迎眾多夥伴的參與，包括日本、歐盟、大陸及其他國家。「太平洋足夠容納我們全部。我們的共同目標就是促進此一重要區域的和平、安全、及繁榮」（U.S. Department of State Website, 2012.8.31）。這樣的談話似乎呼應了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本年訪美前所提出之論點，但值此美國即將進行總統大選、而中共也將進行「十八大」人事改組之際，柯琳頓本次訪問北京希望能與大陸方面商談南海以及釣魚臺問題。然而，大陸媒體於事前對柯琳頓此行多作負面解讀，認為美國所謂「再平衡」政策，實際上就是要圍堵大陸，而柯琳頓本人身為重返亞洲政策的推動者，必須為美「中」之間不斷增加的相互猜疑負責（環球時報, 2012.9.4）；另也有分析家指出，南海問題是大陸的核心利益，而柯琳頓此行應有不能挑戰其核心利益之認識（人民日報, 2012.9.5）；大陸軍方也於日前在廣州、成都與濟南三大軍區進行實彈演練。

9 月 4 日柯琳頓抵達北京後，即與楊潔篪展開會談，柯琳頓表示將追求美「中」之間的合作關係，試圖營造友好的談話氣氛。9 月 5 日上午胡錦濤與柯琳頓會面，胡錦濤一方面提及柯琳頓前往大陸訪問之次數，另一方面也希望美國能注意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避免美「中」

經貿方面的摩擦，並放寬對大陸高科技出口的限制。然而，雙方並未觸及釣魚臺及南海問題。在楊潔篪與柯琳頓共同召開的記者會中，楊潔篪重申大陸對於南海問題的立場，認為相關爭議應直接由當事國透過「直接談判和友好協商來加以處理和解決」。這樣的主張，明顯地與美國希望由大陸與東協國家透過多邊談判解決爭議的方式不同。楊潔篪同時也表示，「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安全是有保證的」，使得柯琳頓最後表示透過外交程序進行對話，對各方都是有利的（新華網，2012.9.5）。

柯琳頓此行引起最多關注的，是大陸突然取消了習近平與柯琳頓的會面。雖然楊潔篪希望各界對此事不要進行不必要的猜測，並表示習近平同時也取消了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以及俄羅斯官員的會面，但由於這是相當不尋常的舉措，仍引起各界揣測。截至目前看來，應仍是與釣魚臺及南海問題有關：就象徵意義而言，大陸可能藉此對美國表達不滿。就實質意義而言，繼日前美國國務院以「尖閣群島」稱呼釣魚臺，並表示該區域適用「美日安保條約」後，日本媒體報導野田內閣將於近日以 20 億 5 千萬日圓的價格，向民間完成收購釣魚臺並正式將之「國有化」。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則藉例行記者會表示，「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當前中日關係發展受到嚴重干擾。要改變目前的狀況，日方必須立即停止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錯誤行為」（大陸外交部網站，2012.9.6）。

（四）我國扮演和平締造者積極角色之可能

由於大陸與本年東協之輪值主席國柬埔寨關係密切，「南海行為準則」很難於 7 月間得到討論是可以預見之事，但區域情勢不穩，恐將影響宣誓要重回亞洲的歐巴馬政府之選情，這也是柯琳頓此次亞太行在印尼表示希望各方可在 11 月間東亞高峰會召開之前開始討論之原因。

我國身為南海相關爭議的聲索國之一，馬英九政府於上任後積極將我國塑造為區域和平締造者，總統本人並於 8 月初針對釣魚臺情勢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在主權歸我的情況下，開展與其他國家共享資

源的可能。我政府高層官員及民意代表近期往訪南沙之太平島，且駐守之海巡部隊並進行火砲實際演練，有助於強化我國對太平島之有效控制。未來，我國需注意釣魚臺與南海議題之連動性，以及美國、大陸與周邊國家如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在釣魚臺及南海議題之立場與看法。